

万济国汉语教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朱 勇

提要

根据朱勇 (2005) 对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 300 年前完成的《华语官话语法》一书中汉语教学思想的梳理，本文对这些思想之于今天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现实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认为，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应该并重，有必要加强课外的语言环境建设；应自觉运用语言对比方法进行教学，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应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语音、词汇和文化等的教学。总之，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思想的核心应该是实用性。

关键词

汉语教学思想；语言环境；语言对比；实用性

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 · 瓦罗 (Francisco Varo 1627 ~ 1687, 中文名为“万济国”和“万方济各”) 是晚明入华的西班牙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他著有一本教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华语官话语法》，在其有生之年，此书以手稿形式广泛流传，被同行评价为一部优秀的语言学习课本 (万济国 2003: F23。下文页码均表示引自该书)。该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书，它的印行翻开了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一页。

外国人在学习和传播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及汉语学习的难易度等也会从不同的视角有所思考，而且由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当时已经有了相对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们多能借用西方语言研究方法来描述分析汉语，有些成果不乏理论创见，可以说，外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对于中国近代汉语史的研究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库。除此以外，这些研究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虽然该书撰写于

300 年前，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思想（朱勇，2005），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 重视汉语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言环境建设

万济国对语言环境非常重视，在书中多处提及语言环境的重要性问题（朱勇，2005）。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语言环境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但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还有待加强。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单位有必要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创设良好的课外语言环境。我们不能只重视课堂教学，还要重视课外的时间，汉语教学要向课外延伸。因为，课堂时间是很有限的，而且“课堂汉语”跟“生活汉语”无论是语体、语境还是语速都存在一定的不同。史有为（2005）指出，“语言是感性的具体的，只有理性和抽象的掌握并不能真正掌握活的感性的、具体的语言。只有回到感性和具体才能说掌握了语言。”他这段话尽管论述的不是语言环境问题，但同样可以作为我们对语言环境重视的理据之一。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来加强语言环境建设。

1. 要求学生多用目的语交际，创设一个自觉的汉语环境

万济国非常重视目的语的输出，强调使用目的语的重要性，强调应在实际运用中掌握汉语。他明确认识到，通过目的语的输出不仅可以学习目的语的“用语”，而且不容易忘记目的语，可以“保持牢靠的记忆”。

一方面要学习词语，另一方面要学习措辞和词序。只有通过这样做，才能实际掌握这种语言。如果我们的教士宁愿一个人呆在小屋子里，而不去跟人交往并学习这些用语，那么很容易就会把它们遗忘。（P15）。

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留学生究竟应该单一国籍编班还是多国籍编班。其实这也是一个局部语言环境建设问题。客观地说，单一国籍编班和多国籍编班各有利弊。单一国籍班的教学可以使用国别教材，语言项目的教学可以更有针对性。但从实际教学过程来观察，单一国籍编班会出现一些问题。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些学生（尤其是日韩学生比较集中的班级）课后很少使用汉语，而是习惯地用母语进行交际，其口语水平跟多国籍的平行班相比明显要逊色得多。原因就是多国籍班的学生来自多个国家，无法用母语进行交流，只能输出汉语。不过，另一方面，多国籍班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他们无法使用国别教材，教师对语言项目的处理相应地也就缺乏针对性。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操作。像汉语课、口语课这些主干课在目前情况下（国别教材还很少见，只是部分课本采用了多种外语来解释语言项目而已），宜多国籍编班，而一些汉字、词汇、阅读等选修课则可以单一国籍编班。拿词汇课来说，日本学生就比较特别，因为日语中存在大量汉日同形词，此时单一国籍编班教学将会更为有效。这样操作，既能避免留学生教学区内大量使用母语现象，又兼顾了带有一定国别特征的问题。

2. 强制性目的语环境的作用

万济国认识到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他说：

要学会这种东西（口气），除了通过与那些能够流利地说这种语言的人交谈来尽力模仿，没有别的方法。……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便捷的途径就是把新来的教士安排在那些能够把汉语官话说得很标准的省份或城市，那样他们就能轻松地学到口气，就好比让新的容器保留起它们盛装的新酒的香味那样。（P13）。

这种将传教士直接安排到“官话说得很标准的省份”的做法很可能受到了其所属的多明我会的语言教学方法的影响。多明我会通过为新教士开设语言课程来深入掌握语言。语言教学方法包括：只用对象语言，采取严格措施，禁止在语言课堂上或者课下自习时讲拉丁语或西班牙语（F31）。这一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就像现在的“语言契约”一样。所谓“语言契约”就是学习某种外语的人与所在的语言教学单位签订一个契约，契约规定，在进入一定地域（如该语言教学单位）后就只能说目的语，而不能说母语或其他语言。王晓钧（2005）曾举例提及该法：

在美国著名的明德学院及九十年代初期的印第安那大学 EASLI，学生一进校就要跟学校签订合同，即只能说中文（目的语），不能说英语（母语）。如果违约，校方可以开除该学生。……这样的教学法，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并创造奇迹。不少学生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能从根本无法用目的语交流发展到能用夹生的中文来完成一般性交际任务。

由上述可知，语言契约的作用是明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模仿这种方法。但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其中一条就是：要重视

目的语语言环境建设，以“迫使”留学生自觉地多说目的语。

3. 创设课外自主的语言学习环境

如果说课堂学习多为有意识学习的话，课外学习则带有很大的无意识习得成分。如何为学生的课外习得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呢？

(1) 在校内创设汉语角。笔者目前在日本某大学担任客员教师，下面简要介绍该校汉语角的做法。他们利用中午时间开展汉语角活动（此外还有英语角、法语角和日语角等），往往根据参加的人数做出合适的次数安排。现为一周两次，一般每次参加人数为30人左右，日本学生自愿参加。中国人主要是在该校留学的中国学生，该校国际科邀请他们参加。参加者可以边吃边聊，但只能说汉语。根据笔者的观察，常常去汉语角的学生其汉语水平往往要高一些。若在中国的有关汉语教学单位设立汉语角意义更大。因为：(一)这样留学生既可练习汉语，又能解决一些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像在中国购物时如何讨价还价、询问旅游景点的路线等）。(二)通过汉语角还可以与中国学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增加其对中国的好感；中国学生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国外，拓宽自己的视野。

(2) 课后提供教室播放中文影视节目。据笔者和留学生的交谈情况看，初中级水平的留学生多数不知道如何选择电视频道以及应该收看什么节目，所以有必要请老师或中国学生对留学生（尤其是初中级水平的学生）如何看中文电视加以指导，帮助他们了解电视频道、学会根据节目预报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电视是一个了解目的语国家国情和文化的便捷窗口，电视所具有的教学作用、自主学习作用不容忽视。因为电视是鲜活的、立体的，既有话语，又有表情、动作，有的节目还有字幕，尽管电视里的语速要比老师的快、词语要比教师话语难，可在剧情、动作以及字幕的帮助下，学生逐步会理解。有的学生上课时表现一般，可是水平却不低，他们爱看中文电视剧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3) Home stay (住家) 方式。Home stay 是一种留学生住在目的语国家国民家中的生活和语言学习方式。中国大陆 Home stay 还不太。据笔者了解，留学生和中国家庭在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异，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韩国女生曾告诉笔者，中国阿姨想让她搬走，原因

是她每天洗两次澡，阿姨觉得她洗澡次数太多，费水费电。尽管这仅仅是个案，却也说明 Home stay 尽管有利于语言学习，可也易引起生活上的冲突。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外合作项目对 Home stay 愈发青睐。几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和美国 IES 合作项目中部分学生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此外，2005 年夏首届北京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项目开班，该项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近一半的美国学生以 Home stay 的形式住在北大老师的家里。之所以大家积极地这样做，就是因为能够多角度地帮助留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更生动、全面地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4) 为留学生创造高质量的汉语实践机会。拿北京的高校来说，目前也有一些诸如留学生参观企业、京郊农家乐和中国国内旅行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留学生某种程度上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的情况，但因为走马观花，对语言学习而言效果甚微。我们觉得可以采取一些稍有深度的活动，如：(一) 鼓励并选拔优秀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学习。像北大，要进入非中文学科学习均要先经过预科的学习，通过测试后方可入系。而针对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没有预科一说，选优秀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学习，这是一种奖励措施，可以起到激励作用，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更深入地和中国人交往。(二) 为留学生提供一些类似在中国企业与中国员工一起工作的汉语实习环境。(三) 在中国举行的一些国际性会议、体育比赛甚至 2008 年的奥运会等国际活动，也可以选拔一些留学生作为志愿者。这些举措可以为留学生创造更多高语域话语的输入输出机会，是培养高级汉语人才的一个重要方式。

这些语言环境建设活动将引导留学生自觉地浸入目的语语境中，使其汉语学习效率的提高有了更大的可能。通过它们，不仅可以复习巩固课上学习的内容，还可以通过伴随性方式 (incidental learning) 学习词语、语法和文化等等，作用丝毫不亚于课堂学习。

二 自觉运用语言对比方法进行教学

在《华语官话语法》的弁言部分，万济国指出，“在汉语里，词项的拼写法与我们卡斯蒂利亚语的发音是一致的；如果照法语的发音那样来读的话，就会读错很多地方”。“为了避免这类模棱两可的情况”，万济国将汉语的语音

与法语的发音进行了比，还“做了一个异同对照表，用它来作为发音的指导（P5）。”在语法部分，该书也自觉地进行了语言对比。比如该书讲到“于”时，将之与拉丁语进行了意义上的对比（P40）。类似的语言对比在书中还有很多。

我们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有必要将母语和目的语的语音、语法、文化等进行对比教学。其中对于语音的对比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较之语法对比教学或许更易施行。因为：（1）语音数目有限，相对封闭，可以穷尽；（2）发音的错误倾向性较之语法要更明显，更容易总结出规律。因此语音对比是最先要做的工作。将汉语的发音与学生母语的发音进行对比，总结出各国学生的发音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语音教学，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洋腔洋调现象。

此外，拿日本留学生来说，汉日同形词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同形词也是封闭的，可以对照《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国家汉办，2001），穷尽地列出汉日同形词，建立同形词分类标准和等级划分标准。而现有的《大纲》并未考虑日本学生的母语特点，有些汉日同形词的等级划分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不科学的，如：同形同义同用法的同形词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容易，可是有的却属于丙级词，甚至丁级词。因此有必要在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汉日同形词等级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分类、分级的《汉日同形词学习手册》，以提高日本人学习汉语词汇的效率。

还有，国别教材尽管现在还比较少见，但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规模逐渐扩大，留学生对学习效率的期待越来越高，国别教材的编写势在必行。国别教材的编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进行汉外对比，这样可使语音和语法等语言项目的教学更有针对性，这也是编写国别教材的目的所在。

三 根据汉语特点进行语音、词汇和文化教学

1. 语音教学

万济国对发音很重视，在该书中他用整整一章来处理语音问题。其中，作者对语音的描述非常到位，有利于学习者模仿。比如，作者对“e”的发音描述，“在发音时要把嗓音压抑在齿间，就好像嘴里含着东西。”对j的发音描述，“以j开头的词，发音时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有两个ii用力碰撞，并且带有中度的嗞嗞声”“这与欧洲人发该音的方式不同。”还有，“以x开头的词，发

音时要略微开口，先发类似的声音，但更轻柔，然后卷起舌尖，抬高舌位，就像西班牙乡下人发这个音那样（P28）。”这些有关汉语语音的描述非常形象，可操作性极强，因此非常便于学习者按照他的描述去模仿发音。万济国对有些语音的形象描述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样做非常便于学生模仿，甚至使学生能够“无师自通”。这将大大增强留学生对语音的自学能力。

声调是汉语语音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中的变调也是留学生的学习难点之一。万济国认为，变调这种方式“要等到我们入了门、使用汉语已很自如的时候才有用，而一开始新教士仍必须按照1-5（指《华语官话语法》中有关汉语基本声调的描写）的描述，认认真真地发好每个声调（P23）。”也就是说，变调的训练必须在学习者已有一定汉语语音基础以后再教，要顺其自然，不要一开始就教，否则无异于拔苗助长。

他还指出，“我们说出来的一个词项的声调，要与我们打算表达的思想相一致（P12）。”言下之意，变调是语流中的自然现象，我们在交际中不要为了变调而变调，而且变调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更好地达到交际效果。

他的上述想法基本上是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不过，笔者认为，变调的一些基本知识可以在学生初学阶段讲授给他们，比如：“一”“不”的变调，让他们对变调知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至于大量的变调训练，则应等学生的汉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像万济国说的“使用汉语已很自如的时候”，再在语流中进行，这样做符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规律。

2. 词汇教学

《华语官话语法》中多处注意到了汉语的特点对汉语词汇学习的影响：

（一）注意到语素对汉语学习的作用。他指出，“在这种语言里（汉语）有一种做法很常见，那就是把两个独立的、意义不同的词组合起来以表达一个事物的意思；而在我们的语言里往往就只用一个词来表示。其结果是，一个给定的词包含着从读音到意义都不同的两个词项（P16）。”“复合词是一个意思，而其中各个词项又各有自己的意思（P17）。”语素对学习汉语词汇的影响问题至今仍有学者在探讨，而300年前的万济国就对该问题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见解实在令人叹服。

（二）注意到复合词内部语素顺序问题。复合法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构词法，

有时候复合词内部语素的前后顺序不允许颠倒，有时候则颠倒也无妨。万济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排列和组构复合词的时候我们要把话说对，小心不要出错，学会像中国人那样处理和使用。因为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词的意思就会改变，或者什么意思也表达不出来。例如，表示“帝”的意思，可以说“皇帝”“朝廷”或“天子”，但是当我们欢呼的时候，如果说成“帝皇”“廷朝”或“子天”，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不过，也有那样一些复合词，颠过来倒过去，其意思都不会改变，例如：要紧的——紧要的，兄弟——弟兄（P15）

确实，语序（句子语序和复合词内部语序）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把握不好语序问题将会在汉语学习中碰到很多困难。如何根据汉语词汇的特点进行教学，是教授汉语词汇的一个根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找对教学方法。

3. 文化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交际过程中文化无处不在。万济国在该书中专辟了第十四、十五、十六等三章对汉语的礼貌用语、称呼用语作了一定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特别懂礼貌和讲礼节，在这些方面他们花了大量的心思（P147）。”因此，“对于传教士来说，熟悉这方面（礼貌用语、礼仪行为以及正式社交中的书信表达）的最新知识很有必要（P147）。”万济国之所以意识到这一点，是跟其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性动机分不开的。为了传教，他们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实际交往中的礼仪，这样才便于其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华语官话语法》一书中的文化教学思想及其启示，来静青（2005）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可以参看。

四 结语

语言是规则的，可她又充满例外；语言是清晰的，而她又尽显模糊。这些例外大多只能在生活中、在目的语环境里习得；这些模糊则需要在语言交际中体悟、掌握。《华语官话语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讲求实用，一切从实用出发。Breitenbach 是这样评价的，“传教士们热衷于编写外语语法，主要不是出自科学兴趣，而是为了尽快学会外语，以便有效地宣讲福音。”（F22）

什么方法最容易就采用什么方法，这种动机自然使得他们的汉语学习充满了实用性。上述课外语言环境建设、语言对比教学等等追求的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弗朗西斯科 · 瓦罗（姚小平、马又清译）2003《华语官话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家汉办 2001《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来静青 2005《华语官话语法》中的文化教学思想与启示，《海外华文教育》第 1 期。

史有为 2005 关于语篇 - 词汇主导教学，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编《对外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晓钧 2005 互动性教学策略及教材编写，《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朱 勇 2005 万济国的汉语教学思想研究，载李向玉、张西平等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 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出版。